

寻找“林仰崢”

(上)

沈芸

一、木刻

2023,癸卯年。一只热情的兔子被黄永玉先生画成了奔放的蓝。

烈日当头,骄阳似火的6月,提前到来的酷暑,炎热的天气更加漫长。

6月13日这一天,我按计划如约来到“微言”出版工作室,要跟编辑们开定稿的最后一次会。喝着杯泡好的香茶,把室外的热浪抛在脑后。

到了书的封面,这一极为重要的环节,我已经想了很久。缘起于黄永玉近期的画展《入木》,在黑白木刻的世界里,徘徊得越久越能感受到刻刀下百转千回的力量和柔情,我认为这正是《一个人和一群人》(增订本)所要表达的。

于是,大家的目光都锁定在了林仰崢1995年5月创作的《夏衍像》上。我祖父是那年春节后去世的,林仰崢从1939年起就跟随着他,刻在木板上力透纸背的每一刀,千言万语,情深意重。这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同时,也入藏了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馆”。

“我们的父亲黄永玉因病于2023年6月13日3时43分离世。我们尊重他的意愿:不举行任何告别、追悼仪式……”这条讣告在社交媒体上出现时,我们仍在开会,黄先生那幅1962年的《夏衍像》版画作品要放在书的首页。而我是坐在回程的车上,才看到这条消息的瞬间,我整个人都怔住了……姜德明和袁鹰两位老人相继离去,我爷爷的那一时代渐行渐远,最后的几个背影也追随而去了。

出生于1924年的黄永玉称自己是“左翼的末梢”,林仰崢比他长一年,1923年生人,他是《救亡日报》《华商报》时代“文艺的小兵”,今年正好是百年诞辰。

二、“夏公”

“夏公”,这一称谓是从什么时候叫起来的?当时的夏衍,其实刚刚进入中年,但是,由于他在文化界(特别是戏剧、电影界)深得众望,在他身边团结了相当一批文化界的朋友。这些活跃的、充满朝气的朋友们,在一起研究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称谓这位兼备着师友、兄长之风的“带头人”?大家商量来商量去,叫“老夏”,似乎不足以表达众人敬爱之情;称“夏老”,他距离“花甲”之年还很遥远;于是,一个聪明的提议出现了。称之为“夏公”!这样,既表示了大家对他的崇敬,又避免了过早以“老人”相视。这个称号被广泛应用起来,以后一直沿用下去,直到八十年代。(会林、绍武:《夏衍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6月)

这部第一本《夏衍传》出版时,我祖父正值85岁,渡尽劫波,枯木逢春,身边聚集、围绕相濡以沫的老朋友们,吴祖光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以上这段话表述的背景是在1944年冬,抗战即将胜利,在重庆和大后方颇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新民报》的经理陈铭德找到吴祖光,请他带话,借重夏衍的名声,邀请其为重庆版的《新民报晚刊》助力文艺副刊《西方夜谭》。吴祖光与我祖父的相识是在重庆北碚1942年的六七月间,吴祖光带着自己的第三个话剧剧本《风雪夜归人》来了,“大约在三两天之后,就和我做了一次长谈,在北温泉淙淙流水、竹林旁边的石凳上,我得到长者、知音人的鼓励和指点是终生难忘的。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那年我25岁,夏衍先生42岁,正在壮年。那时候文艺界朋友们都称他做‘老夏’,到了五十年代,改称‘夏公’,直到现在”(吴祖光:《永别夏公》)。

而《救亡日报》的同人们则众说纷纭,普遍认为是在桂林时代。

当年的记者戈今在一篇《(救亡日报)在桂林》的文章中说,老夏,是同志们对他的昵称。华嘉的回忆是夏衍同志办报十分重视言论和副刊,“报社的同志闲谈起来,都这么说:‘夏公真是有用不完的精力。’我们当时都习惯称他做

我也找到高汾的女儿高宁,她的回答是一样的。我向花城出版社的朋友询问,同样没有了下文。

无奈之下,我开始求助于流媒体,希望能够广东的美术界和出版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没想到,我的一位单位同事和一位电影学院校友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她们完全不了解林仰崢和他的木刻,却热心关注那一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分别帮我找在广东的美术界朋友询问。从她们传达过来的信息中,我得知林仰崢已经离世了,具体情况不详。其中,我的校友联系了她认识的当代画家曹斐,曹斐再托不同的人各处打听。曹斐的父亲是雕塑家曹崇恩,1996年的雕塑作品《夏衍》(右下图),入藏中国美术馆。

很遗憾,曹斐所联系的渠道到了《羊城晚报》这一环节就中止了。我不甘心于此,想到了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馆”黄显功主任。他是木刻版画研究专家,也是我的老朋友。他帮我请到了广州美院的郑星球老师帮忙,郑老师问到了很多人均无果,最后问到了林仰崢是在《羊城晚报》退休了,并给了一个老干办主任的号码。我拨通了电话,对方说,她在这个部门13年,从未听说过这个人……我仍然要坚持,脑子里飞速搜索着,急转弯一下子想到了我爷爷的一个老朋友的名字:胡希明!马上问对方:胡希明同志的女儿胡区是《羊城晚报》的吧?能不能联系上?对方很快答复:胡区是有的……

我跟胡区顺利地通上了话,她很惊奇最近为什么总有人要找林仰崢,并且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具体的时间不太清楚。

我们一起回忆了往事,她的父亲与我祖父相识于广州西关长寿路的《救亡日报》,共事于香港的《华商报》。

胡希明在《天南地北忆夏公》一文中写道:“直至今天,‘华商报史学会’仍把夏衍同志作为老领导看待。而他却谦虚地说,他自己当年不过‘是一个随传随到或不传自到的撰稿者’。”为了怀旧,胡希明在1988年还曾去香港找一家简陋的北方小饭馆“海景楼”,那是当年在《华商报》附近,他们经常聚会喝酒的地方,得知早已拆掉了,“如今高楼林立的香港,当然不可能再存在那么一间薄利的北方小饭馆”。“其实,我们不过是找个地方坐下来聚一聚,聊聊天,而好喝酒的,有乔冠华、聂绀弩和我。夏公是不喝酒的,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自制力非常强,在我心目中,他永远地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非常年代,当胡希明听到熟人偷偷地传言,“夏公被押到山西临汾,腿也被打折了”,心里郁闷至极,写诗一首以寄托思念:“梦里年华却倒流,醒来雁唳汾河秋。江东子弟知无几,南国佳人白白头。”

胡区印象最深的是1986年2月,我爷爷去深圳开会,特意在广州停留几日,住在解放北路迎宾馆。她父亲患脑血栓后,不良于行,“夏公的腿也不好,他竟拄着拐杖,由女儿沈宁陪着,登上三楼我的住所来看我。我们眼里盈着泪水,相对无言地坐着。我的心头很激动,半个世纪的人事沧桑,千头万绪,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过后,我爷爷对胡区说:“我们不用说话,互相看着对方,身体还好,就有了安慰。”爷爷每次去广东,都会带烧鹅和叉烧回来,那一次,姑姑也是忙着跑菜市场采购烧鹅、荷兰豆,准备乘飞机带回北京,当胡区告诉她爸爸,这些都是夏公爱吃的广东菜时,胡希明写道:“我忽而感到时光倒流,似乎回到了当年在香港那段令人兴奋而难忘的日子。”

很快,胡区那帮我问来了林仰崢儿子的电话,可是我拨过去,始终无人接听,留了信息也没有回复,这条线索又断了。

四、文化城

王仿子说,《救亡日报》报社实行的是“原始共产主义”,工作人员一律不支薪水,写文章不付稿费,每月只有5元零花钱(也有说是3元),这个“原始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家长是夏公。夏公是

桂林这座文化城的大忙人,社长郭沫若远在重庆,这副担子全部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救亡日报》当时销售8000份,这个数字在抗战时期的桂林是很可观的了。然而报社的经济依然非常困难,依旧不发薪水,不付稿费,吃低水平的大锅饭(主菜经常是一盆黄豆芽)。夏公和大家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和我们一样端着饭碗站在楼道上吃饭。这是一天中难得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刻,边吃边谈……无所不谈。这是我们年青人受教于夏公精辟见解和丰富学识的一个绝佳机会”(王仿子:《言传身教半世纪》)。

我祖父的这《救亡日报》总编辑职务,是1937年郭沫若回国前,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在上海由周恩来亲自任命的,并且与潘汉年一起谈话的。所以,救亡日报社的党组织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从广州到桂林都不与当地党组织发生关系,在广州,有事由夏衍与十八集团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单线联系,有困难向潘汉年或廖承志汇报。到桂林后,直接受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领导。

杜宣曾说起,1939年,他因上了国民党反共黑名单从江西仓皇出走,浪迹至长沙,后来桂林后“即去找夏公。……大约在1940年夏天,有次夏公通知我说,我的党的关系已由江西转来了,现在由他来管,这以后,我们之间就多了一层关系,来往比以前更多了”。

从广州撤到桂林以后,我祖父赴去长沙向周恩来和郭沫若汇报,正逢长沙大火前坚壁清野的大撤退。周恩来布置了两项具体的任务,其中一项是战事紧张,分散在各地的救亡演剧队已不能和三厅取得联系,而《救亡日报》在桂林是合法公开的报纸,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内,由夏衍与各演剧队保持联系,帮助解决困难。另外一项任务是,周恩来调派了一辆小汽车,让夏衍等护送于立群和池田幸子两人迅速撤离,“立群:你和池田仍坐5292车至桂林,午后出发,一切准备,请予以料理。因火车只能有篷车及敞车也。”(郭沫若致于立群)这辆“老爷”汽车是张云乔送给周恩来调度使用的,车上坐了五个人,夏衍、孙师毅、马彦祥 and 两位孕妇,还带上了池田幸子的一只花猫。张云乔是红色资本家,接受周恩来的单线领导。《救亡日报》的经费筹措、购买印刷机等事宜,都是通过张云乔的公司运作的。皖南事变后,我祖父上了白崇禧的逮捕名单,李克农传达周恩来指示,要他马上转移去香港,也是张云乔用汽车送他去机场的。

为帮助《救亡日报》经济解困,中共南方局决定动员重庆戏剧界举行一次公演。为此,由郭沫若、阳翰笙等发起,于1939年4月12日到14日,公演夏衍的剧作《一年间》,整个重庆的戏剧名都被发动起来了,郭沫若携于立群、阳翰笙带着女儿欧阳小华也登台了,是一段佳话。这之后,桂林在10月也搞了一场轰动整个山城的《一年间》义演,周伟在普通话和桂林话的两种语言的三个剧组担任角色,高汾、高灏姐妹被推上了舞台。那次震动广西全省的公演,揭开了桂林抗战戏剧运动的序幕。

演出结束正是重阳节过后,《救亡日报》上登载了田汉诗一首《过桂林杂咏:寿夏衍四十四生日》。周伟记得,《救亡日报》邀请部分演职员和桂林文化界人士聚餐,欢庆夏公四十大寿和义演成功,聚餐地点设在中环路张云乔家中,张云乔的汽车修理厂和三个烟草店,并不都是他私人的,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地下党秘密联络点。那天中午,在张家客厅摆了几个圆桌,孙师毅纵情豪饮,喝得酩酊大醉。他跌跌撞撞地大叫:祝老夏四十大寿,祝演出成功,抗战胜利!说完噗通跪在演员面前,又哭又笑。高汾说,那天当场他取了一个“屠公”的外号。

其实,祝寿与义演一样,都是南方局在当时的国统区部署的文化统战策略。我祖父在《懒寻旧梦录》中,是这样分析当时桂林各派系的:“周恩来同志要我办《救亡日报》的时候,就决定了我的工作重点是宣传和统战,因此,当报纸复刊之后,我就得拿出一部分(或许可以说是大部分)时间去做好统战工作。当时的桂林,在大后方被叫作‘文化城’。由于那时的桂系在政治上还算比较开明,所以蒋介石的复兴社,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CC、孙科的‘太子派’,宋美龄的‘夫人派’……当然还有坚持与中共合作的进步组织,都要在这个地方建立据点。于是有人谈,当时的桂林(乃至广西)是一个‘群雄割据’的局面。”

在如此复杂的格局中,以《救亡日报》为首的宣传路线和抗战文艺的左翼导向,始终把控、占据了大后方的舆论方向与制高点。对此,左洪涛有过很清晰的论述:在文艺战线,我们党和国民党在力量对比上,我们历来占优势。就是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派在实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实行“文化围剿”,都没有改变这种状况。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诸如重庆、桂林、柳州等地,那就更不消说了。

半个世纪过后,1991年5月的一天,周伟陪着国民党左派、广西民主爱国人士陈此生的夫人盛此君,来到大六都口14号,她请我祖父为《陈此生诗文集》作序。周伟回忆说,一见面,夏公就高兴地说,他非常怀念桂林的那段生活,“陈此生公做了很多好事,八路军办事处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救亡日报》在桂林得以立足,都与陈此生公替我们铺路搭桥,沟通广西地方势力有关。陈此生公为我们所做的这些好事,我是不会忘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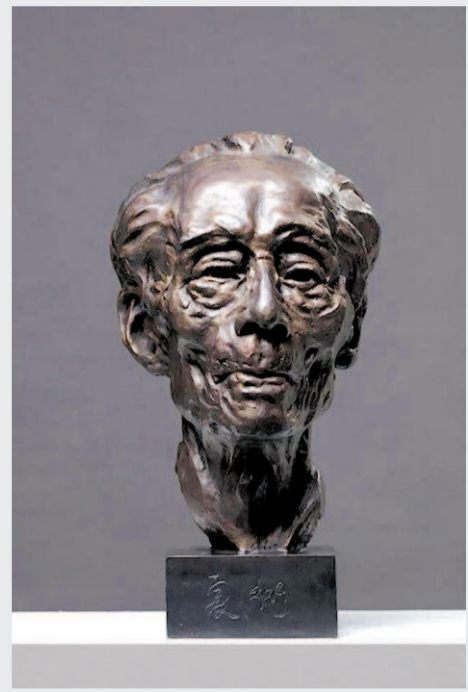
五、足迹

书的印制已经进入倒计时,看来找到林仰崢后人的事情只能留待后面解决了,我特地在“后记”中加了一段“补记”作出说明。

我决定暂时放下追踪线索,去查文献。很快,在旧书网上有了意外的收获。我托朋友买到了一本“林仰崢木刻版画60年”作品



封面设计采用林仰崢木刻《夏衍像》的《一个人和一群人》(增订本)



曹崇恩雕塑的夏衍像

集,书名是我祖父题写的“黑白足迹”,印数是1000册,2000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那一年,林仰崢77岁。

我祖父总是叫他“小林”,这个最为人熟知的称呼也是他的笔名之一。

林仰崢的美术足迹起步于桂林的《救亡日报》,经过《华商报》《新华日报》,从1939年到1944年,尤其与我祖父息息相关。他由担任美术编辑入门,设计木刻头像和杂志、书籍封面,如夏衍著《水乡吟》、戈宝权译《在北冰洋》,秦似主编的杂志《野草》及潘梓年主编、乔冠华副主编的《群众》周刊。

《救亡日报》停刊后,他与报社部分同人逃亡香港,参加《华商报》创刊。得到了叶灵凤的照顾,借阅叶家大量的美术藏书,在绘画上开阔了视野,叶灵凤还送给他一套难得的日本刻刀。其间创作的《渔人之子》木刻组画,茅盾大为赞赏,将之发表在其主编的《笔谈》期刊上。

香港沦陷后,林仰崢参加“香港大营救”的行动,与陈秋帆一起掩护茅盾夫妇、宋之的夫妇、乔冠华等内撤,由东江纵队安全接回来。在桂林等候回重庆期间,他为胡仲持翻译的《森林里的悲喜剧》刻了十几幅插图和封面画。

1942年以后,在重庆《新华日报》时期的工作,是林仰崢一生创作中的黄金时代。1943年4月,筹备于桂林的“香港的受难”画展转至重庆展出,由原来的作者6人,盛此君、杨秋人、温涛、黄新波、郁风、特伟,增加了3人——叶浅予、丁聪和林仰崢。林仰崢的五幅作品中,反映香港18天之战的《码头》和《神圣的教堂》引人注目。我祖父对林仰崢说:“今后能开这样激动人心的画展就好了……周恩来同志很忙,他也很想光临。”10月2日这天,周恩来致电时任总编辑的章汉夫,指示:“《新华日报》发表威尔基(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到渝的消息,要特别隆重突出,压倒所有国民党的报纸”。林仰崢在深夜花了半个小时速刻出威尔基的木刻像上机付印。次日一早,周恩来见报后非常满意,即来电给作者传令嘉奖。

1944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为保存力量,报社人员进行疏散隐蔽,林仰崢以教师的身份回乡教书,创作了《军民一家》《谁能帮我们重建家园》等。

1949年5月间,林仰崢接到通知前往香港,进入东江游击区,参加广州的解放接管工作。同时,林仰崢的木刻版画也迎来了丰硕的成熟期,1953年的《这是我们工作的意义》《试机》,1954年《爸爸在工作》,1955年的《蔗渣造纸成功的时候》,这一系列大工业背景的作品,时代特点突出生动,尤其是《爸爸在工作》,获得了一致的高度评价。

可惜好景不长,林仰崢在1956年以后受到冲击,不再被组织信任。他的创作陷入了低迷,1962年的《吃立在加勒比海》注了一行字:多年不动刀,怕丢荒,这是试刀之作。

林仰崢有五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均为他的精品:《神圣的教堂》《这是我们工作的意义》《试机》《爸爸在工作》及《夏衍像》。他创作过一系列的人物木刻像,只有《夏衍像》这幅作品入藏。他在刻画像时,我祖父刚刚去世,不需要应景,也不需要逢迎,林仰崢把这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思绪和怀念都留在了每一笔的刀痕里。与以往的画像追求形似相比,《夏衍像》的现代性更为显著,超越形似,直达神似。画面里还蕴藏着一种对父辈的丰富而厚重的情感——他们有过《救亡日报》《华商报》的广州、桂林、香港经历,同人们朝斯夕斯,念兹在兹。这段经历的深意,旁人很难抵达。

1998年,林仰崢刻了一幅兄长林林的画像。1999年,他为自己作了一幅自刻像,落刀如封笔。

(未完待续)



爸爸在工作(木刻)林仰崢

笔会

记录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